



考古學裡的性別研究

文 | 江芝華 |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助理教授、國立臺灣大學婦女研究室研究員

考古學是一門透過不同的證據嘗試訴說過去的學科，透過考古學的研究，我們企圖討論「現在」是如何形成。但是，更重要的是，這些對於過去的討論，常被用來合理化、自然化我們當下的各種行為。「自古以來」這一說法便常常是我們為自己行為辯護的藉口。看看當臺灣社會開始在討論多元成家法案時，社會爭論著何謂家庭，最常聽到反對的理由便是多元成家違反傳統，家庭自古以來便是一夫一妻，彷彿加入時間的長度，討論就可以終止。然而過去社會真的是這樣嗎？自古以來到底是多古呢？

對於人類過去，我想考古學所能理解的時間深度應該是遠超過其他學科，考古學者運用不同的線索，論述不同時空裡可能有的社會樣貌，這個時空可以早至數百萬年前，當我們的祖先開始在非洲大陸直立而行。然而在考古學這學科長達百餘年的發展歷史中，考古家是如何討論過去的性別關係呢？

其實相較於其他學科，考古學家對於性別的討論晚了許多，更準確地說，一直以來，考古學家對於過去社會性別關係的態度，常常是認為證據不足，避

而不談，或是把當代社會的理解直接投射於過去，成為固化性別偏見的幫兇。諸如男狩獵／女採集、男主外／女主內、男尚武／女柔順，這些當代社會主流的二元論述，常常成為考古家理解過去的假設，這樣的假設又進一步強化、合理化這種對立的性別觀點。

一直要到 1980 年代，考古學家開始想要理解過去社會的性別關係，尤其在女性主義的影響下，質疑過去考古學研究中那些隱而不談的假設，考古學的性別研究才算是真正開始（Conkey & Spector, 1984）。首先，考古學家爬梳、拆解過去考古學研究中瀰漫的男性中心主義，點出女性在考古學論述中的缺席。在傳統考古學中，相對於男性被理所當然的視為人類歷史事件的啟動者，女性身影卻在過去社會的故事中消失，或是被否定其能動性。例如在對於農業起源的討論中，Patty Jo Watson 及 Mary Kennedy（1991）便指出其中的性別偏見，她們認為由於傳統對於男女性別特質的假設，相對於主動、積極的獵物追尋者，女人被視為被動、消極的植物採集者，但是當考古學家在討論農業起源時，卻又可以忽略女人與植物

等性別理論更是提供考古學家新的理論架構來思索過去社會，打破傳統男／女及性／性別的二元框架（Ghisleni, Jordan, & Fiocoprile, 2016），進而探索過去社會中性別關係的多元樣貌，人群性別認同的流動性及性別與其他社會角色間的交織性。

性別考古學的發展在歐美社會已近數十餘年，反觀臺灣，性別議題在過去考古學的論述中一直未受重視，然而在進入二十一世紀的當代，隨著臺灣考古社群的多元化，女性考古家數量的成長，透過考古學方法來論述過去性別關係的研究開始出現。本期專題「考古學裡的性別研究」則為國內第一次匯集了五位考古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嘗試討論性別關係，展現當代臺灣考古學家對於性別議題關懷的多元面向。

首先，內田純子透過殷墟豐富的考古資料，搭配相關的文獻紀錄，嘗試論述在這個中國最早有紀錄的都城遺址中可能有的性別關係。都城遺址往往是被論證人類文明發展的重要證據，傳統學者注目的焦點通常放在都城中公共權力的展現、社會階層的建構及社會複雜化的樣貌。然而內田純子卻從性別切入，針對各式手工業進行分析，一步步看到殷墟這個都城中性別化的過程。從內田純子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性別關係並非持續不變的，

長期互動所可能擁有的知識，無視或是否認女人可能在農業起源中所扮演的主動角色。也因此，在指出男性中心主義如何影響考古學家訴說故事後，女性主義考古家更進一步嘗試勾勒出女性在歷史發展歷程中的可能樣貌。也因此 Watson 及 Kennedy（1991）在討論北美玉米的農業時，強調雖然玉米栽培是由熱帶地區傳入北美，但是由於女性與植物長期的互動，協助女性更積極地培育出適合北美洲自然環境的玉米種類。

而女性主義對於科學知識建構的反思更是促使考古學家重新思考論述的基礎，挖掘考古知識建構與考古家所處社會間的關係，更具批判性的自我反思，並強調考古學的社會責任，甚至帶起考古學者重新想像不同書寫的可能，更清楚的連結考古學與當代社群（Wylie, 2007）。同時，酷兒、展演



兩性分工是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逐漸被形塑出來，而這關係的形塑亦和城市化的過程息息相關。

鍾國風則透過民族考古學的實踐，嘗試描繪出阿美族 Lidaw 社傳統的成年禮中被忽略的女性角色。不同於傳統考古學，民族考古學家透過參與當代社群的生活，可以觀察到社群中動態的樣貌，重新理解社會中物、空間及社會關係間交錯的關係。在臺灣原住民社會中，阿美族常被視為母系社會的代表，然而男性的年齡組織卻往往是學者關懷的焦點，與內田純子相同的，鍾國風透過在 Lidaw 社船祭成年禮中女性的行動，勾勒出 Lidaw 社如何透過物與地景，連結了不同性別認同的過程。內田純子和鍾國風的研究皆顯示，性別認同及關係的建構為一互動的過程，非自古以來而固定不動，且性別與社群內其他的社會關係交織在一起，互相影響。

女性主義對於考古學的影響之一是對於傳統分析架構的挑戰。柯渝婕便是在這樣思潮的啟發下，重新去發掘過去長期被忽視的物可能含有的多元意義，她從與人身體關係最密切的陶環著手。陶環為臺灣史前社會常見的物品，通常被歸類於裝飾品而不受重視，更因為裝飾品常常與女性連結在一起，就理所當然的被忽略。在過去的研究裡，面對遺址中出土的眾多陶環，考古家除

了進行初步型制分類外，就未再進行論述。柯渝婕指出這樣的偏見，並進一步透過陶環的型制多樣性，論述史前蔦松的社會關係，強調陶環可能與蔦松人群的社會、性別、年齡、親屬、階級等認同息息相關，而非僅只是史前社會中微不足道的小物。

本專題的最後兩篇文章則分別針對中國西南及日本兩個區域，從過去的研究中爬梳出女性的身影，並思索考古研究者與研究本身間的關係。盧柔君從手工業分工、女性酋長的議題帶出深植於日本考古學討論中的性別偏見，並進一步透過女性研究者在考古學領域的分布及研究議題的分析，指出女考古學者如何嘗試在以男性研究者為主體的日本社會開創出一條新的研究領域。

專題最後一篇文章則是由林圭偵談不存在的邊地婦女。邊地在主流的論述就已經被邊緣化，而婦女更是被視為不存在。林圭偵從神話、歷史文獻中爬梳出不同女性的樣貌，而這些女性的樣貌亦展現在不同物的媒介上，當我們細細觀察這些物上的圖樣，過去社會中女性的形象逐漸清楚，林圭偵更嘗試將 1940 年代中國第一個女性考古家——曾昭燏——的身影描繪出來，並好奇地提問：曾昭燏是如何在以男性為主流的考古圈中生存？而這樣子的書寫，也讓

我們看到女性其實從未缺席於考古研究中，只是她們的研究在傳統父權的學術社會中被邊緣化，而待我們慢慢將她們的貢獻訴說出來。

對於性別關係的探索刺激了考古學者思索新的理論及方法，而這些新的理論及方法則又挑戰了我們對於過去社會性別關係的想像。尤其是女性主義思潮的影響，讓考古學者從根本去質疑學科本身的性質，並將對於性別平等的追求延伸到社會正義的堅持。然而臺灣考古學的性別研究則在初萌芽階段，因此仍主要集中在將女性身影彰顯出來，

無論是針對過去社會的討論或是檢討學術社群的性別關係。換言之，我們對於臺灣史前社會的想像仍停留在二元性別角色中，尚未開始重新思考臺灣史前社會可能有的多元性別樣貌，更遑論探討史前社群中性別與其他身分認同的交織性。而臺灣當代不同原住民社群所展現性別關係的多樣性，其可能有的時間深度及發展過程則是考古學研究可以貢獻的。凝視性別的樣貌，可以為臺灣考古學帶來新的研究可能，也豐富我們理解這塊土地曾經發生過的故事，進一步刺激當代的我們反思面對差異的態度。

參考文獻

- Conkey, M. W., & Spector, J. D. (1984). Archaeology and the Study of Gender.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7: 1-38.
- Ghisleni, L., Jordan, A. M., & Fiocoprile, E. (2016). Introduction to “binary binds” : Deconstructing sex and gender dichotomies in archaeological practice.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23: 765-787.
- Watson, P. J., & Kennedy, M. (1991). The development of horticulture in the Eastern Woodlands of North America: Women’s role. In J. Gero & M. W. Conkey (Eds.), *Engendering archaeology: Women and prehistory* (pp.255-275). Oxford: Blackwell.
- Wylie, A. (2007). Doing archaeology as a feminist: Introduction.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14: 209-216.